

◆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满坡橘花

四月，有一天走在山道边，突然就闻见一阵清香。我马上喊道：“橘子花香。”我为什么如此激动？按理说，早过了轻易激动的年纪。但对于橘子花，我是真的应该激动。我喜欢橘子花。我后来想了想：我是喜欢橘子花的清洁。橘子花，是一种清洁的花。

但同时，橘子花更是一种古老的花。《楚辞》年代就有，屈原就在《离骚》中多次写到，以之感叹人格的高华与独立。我不喜欢过多地将一种植物，赋予太多的文化。有时候，让其回归到植物的天然，或许更有意义。喜欢橘子花，就是喜欢——没来由的发自内心地喜欢。

大概十来岁时，才第一次吃到橘子。酸甜，不好吃。应该是品种的原因，或者说本身吃的就是品质不好的橘子。第一印象的差，便注定了往后对它的不太热爱。虽然工作上曾干过农业，甚至专门发展过柑橘园。可是，没有感情，便视之漠然。直到十五年前的春天，从武汉坐车去神农架。车沿着长江行驶，车速极快，一路手心出汗。开车的是个手腕上缠着一道道檀木串的大汉，嘴里嚼着槟榔，手臂上汗毛森森。同行者提醒他车速太快啦，都一百四啦。他将槟榔嚼得更响，脚下速度又提了十码。大家便再无话，只是两眼盯着车前，祈祷别在这长江边上追随了三闾大夫而去。

忽然，车速降了下来。大家竟有些意外。大汉指着车左边的山坡，说：“我们家也曾有一大片柑橘园。”

原来如此。是故土亲情让他降下了速度。这时，看那山坡，满坡都是橘子树。枝叶浓密，如同一大群乡村上的孩子，挤在土地的门缝前。大汉居然还开了车窗，车速甚至低过了自行车。一阵阵的橘子花香，就飘进了车里。我从未如此近距离且如此纯净地闻过橘子花香。道路左边，是山坡，是橘园；右边，是江水。橘子花若即若离，这正符合橘子的品性。其实，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独立且自由的。它们并不因为人类赋予了它们什么，就格外亲近。它们承载着阳光雨露，承载着它们自己的使命与个性。即使在这临江的山坡上，它们也独立地存在着。它们开出的花，依然香得独立，雅洁。它们并不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慌张，献媚，或者忸怩、高冷。

江水在平静之中，裹挟着巨大的漩涡。再往里走，便是秭归，昭君故里。江水越来越有传说，而我们的车子却停下了。大汉不由分说，下车便跑到了橘子园里。他站在橘园中，仿佛在吸纳橘花香中的精气神。他的神情，令我们感叹：一个能将车子开到一百五十码的汉子，也有如此深情的一面。他蹲下身子，除了头，整个身体都在橘丛中。他拂着橘枝，对我们说：“橘子花，都来看看，米粒似的。”我们便都上了坡，果然，刚才看见的拥挤的橘子枝叶间，都是米粒似的橘子花，白色，花边上有浅浅的青色。如同雨后天空的颜色，又像古瓷的颜色。倘若细看，又如同一个十来岁的少女的眉眼之色。

橘树的枝叶，是洁净的。橘树的花，是洁净的。我们走在山坡上，橘树一直蜿蜒到山顶。大汉此时已从橘树丛中站起来，缓缓地下坡。我们也随之下坡。一行文人，居然没有一个吟诵关于橘的诗句。这情形我很喜欢，至少我们是真实的，不矫情的。我们下了坡，江水在前面形成了一个回旋。有一只小船正从漩涡边经过，我们听得见船公的号子——悠长，苍凉，恰好与这满坡橘花的清静形成了互补。那都是人间的旋律，不过，一个借着香气，一个借着声音。

若干年后，我看到了另外一种花。那是与橘花差不多让我喜欢的花：白兰。我是在一座寺庙门前看到的。那一刻，我就想起了长江边上那满坡的橘花。事实上，那一程，我们离开那开满橘花的山坡后，大汉的车速便一直正常。到了目的地，大汉下车点了支烟，轻轻地，像是自言自语着，说：“我的父母都葬在老家的橘子园中！”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父亲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也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他太平常了，在本地任何史志上都找不到与他有关的半点文字记载，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有着将近60年党龄的农村老党员。他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始终信仰共产主义，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曾中断过交党费。

三年困难时期，村人生活极其艰苦。1960年春上，青黄不接，人们啃树皮，挖草根，把能吃的都吃了。实在没东西可吃，就饿着肚子干活。父亲那时担任生产队长，这个憨厚朴实的干部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由于干起活来拼命又长期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原本就瘦弱的父亲更加骨瘦如柴。父亲在一次挖河泥的劳动中累得昏倒在地，被送到公社医院抢救。队里的社员纷纷来看他，大队支书也来探望他，并送来5个鸡蛋给父亲补身子，他没舍得吃，让母亲煮熟两个分给我和姐姐，另外三个他让母亲卖给食品站换成两角钱交了党费。母亲不理解，埋怨地说：“这是大队干

父亲的党费

吴建

部送给你，让你补补身子的，你都病成这样了，怎么还想着交什么党费呢？”父亲说：“我住在医院，有吃有喝，这比起社员们还饿着肚子干活好多了，还要补什么呢？这个季度的党费我还没交，党组织对我如此关怀，我不能光顾着吃而忘了党啊。”这就是把交党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父亲。

我师范毕业后，被分到远离家乡的异乡小镇上工作。后来娶妻生子，在小镇上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装修时，我和妻子忙着上班，孩子要上学，临时买个装饰材料什么的需要人手，没办法，只得请父亲来帮我们。可家中也离不开父亲，老家有五亩多责任田，母亲一人耕种实在太辛苦了。可母亲还是让父亲来帮我们，她对父亲说：“现在是农闲，田里活儿不多，你就放心去吧，别记挂着家里。”可父亲在我这里守了一个多月，就跟我说要回家一趟，当时工期很紧，不能离人。我问是不是想我妈了。父亲笑笑说：“都这把年纪了，还想你妈干啥？我是两个月没交党费了，我要回去交党费。”我当时



永远跟党走
李昊天 摄

一封没有寄出的遗书

叶炎

你写过遗书吗？我坦白地告诉大家，我写过，而且还是在四十多年前的风华正茂年代写的一封没有寄出的遗书。

1970年代末，新疆有战事。就在这一年，我和几百名刚入伍的安庆籍新兵，未进营房先上战场，随大军南下奔赴前线。

为了保密，前线将士战前一律不准写信，包括我们这些刚刚入伍的新兵。我们年轻无知，再说刚到部队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好奇，倒也没觉得什么，可急坏了我们的父母，他们在家日思夜盼，天天相约坐在邮局门口等信，孩子们怎么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战前的训练紧张而且辛苦，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因为战友们都知道，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大家争分夺秒、争先恐后，白天练，晚上也练。

即将开战的某一天晚饭前，指导员宣布，今晚不搞夜间训练，大家写封家书吧，把要说的话，都写出来，写好后，不要封，连队还要逐个检查，看看有没有涉密内容。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领神会。

连队集体住在河口洞坪农场三分场的一间大仓库里。晚饭后，一百多号人趴在地铺上，鸦雀无声。大家思绪万千，手中的笔重似千斤，不知从何写起。

说是家书，其实就是“遗书”，给谁写，写什么，大家情况各异，但心照不宣。百十号人的连队，只有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有线排长和驾驶班长是已婚人士，他们都是给媳妇写，其他人不是给“村里的小芳”写就是给父母写，但绝大多数都是给父母写。我们是新兵蛋子，纯光棍一条，只有给父母写。

离开家乡快两个月了，先把离开家乡到部队后的情况简单汇报了一下，然后书归正传，直接讲明马上要打仗了，这一仗不打不行，人家都欺负到家门口了，中国人从来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必须要教训教训他，儿子能赶上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是件无上光荣的事，你们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接着就开始交待了，战争是残酷的，万一儿子真的回不去了，你们千万别难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儿子没有机会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没有机会给

觉得父亲有点像五保户交公粮，是不是积极过了头。便不屑地说：“不就是十几元钱的事吗？党还差你这几个钱？”父亲有些生气了：“这不是几个钱的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作为一名老党员，按时足额交纳党费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见父亲这么执着，只好让他回去交党费了。

按时交纳党费是父亲几十年养成的一种习惯，而今父亲年过八旬，这几年多次撤乡并村，村委会驻地离老家越来越远，可村里规定几时交党费，他就几时去，从不拖延。他每次都要走十几里路，有时去了村支书不在，他就等在那里，第一天等不来第二天再去等，直等到村支书来了交了党费才心满意足地回家。村支书感动地说：“这么远的路，你老人家行动不便，迟点交不要紧，不用这样来回跑！”父亲笑笑说：“没关系，反正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事，党费没交心里不踏实。”父亲就这样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一名老党员鲜明的党性和高尚的情怀。

厚望

唐颖中

1984年8月4日这天，我实现了人生最美好的夙愿，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那年我28岁。下午，我向党旗举手宣誓后，心情一直沉浸在激动中，下班途经我的入党介绍人卢会计家的楼下，她在楼上窗台探出头喊住我。我来到她家，她笑容满面地说：“小唐，你入党了，喜事！”随即她让我在客厅稍等一会儿，转身进了厨房。

一会儿，她端出一只白瓷碗，说：“我打了三个糖水鸡蛋，给你庆祝庆祝，同时，我还想对你说，入党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闻听此言，一股暖流顿时涌过全身，我深深感到一位老党员对党的崇敬，对一位新党员寄予的厚望。我双手接过瓷碗，我没有对卢会计说豪言壮语，而是回答道：“您的话我记住了。”凝视着碗里三个圆润滚烫的鸡蛋，我满心的感激全化作对自己的默默告诫：努力工作，不负培养。

此后30多年里，无论遇到困难还是收获，老党员卢会计的那碗“糖水鸡蛋”所蕴含的厚望，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我牢记着自己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不忘初心，践行党的宗旨，脚踏实地工作。卢会计已过世多年，每当建党日，故人总在心头过，每当想起她，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碗“糖水鸡蛋”和她那言简意赅的厚望，我想，唯有“永葆党员先进性，听党话、跟党走”，才是对她最好的告慰。

兽医老党

马海霞

老党是村里的老兽医。从我记事起，家里的猪病了，父亲便去喊老党。老党脾气急，只要有人找他给猪看病，立马背起药箱，一边赶路一边询问猪的病情。路上问得差不多了，待来到猪圈，再实地观察一下病猪，或给猪打一针或留下一包药，临走嘱咐主家多留意，半天后看一看猪吃食如何，再去他家跟他说一下。

多数时候，不等主家跑去告知，老党已先来了，在大门口大声招呼，然后直奔猪圈。老党看病仔细，一头猪病了他不知道跑多少趟，直至猪彻底病愈，他才放心。

老党六十岁就驼背了，年龄越长，背驼得越严重，到了晚年，背都弯成直角了，但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一般人还走不过他。老党说，家畜不会说话，生病了也不能说哪里不舒服，全凭人观察，所以给家畜看病，更需一个快字。

乡亲们说，老党驼背都是低头给猪看病累的，一双飞毛腿更是赶急诊练就的。有一年，父母去亲戚家帮忙盖房子，天不亮走的，回到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母亲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猪拌食，去喂时，发现大花猪趴在一旁不过来吃。以前大花猪抢食厉害，其余三头猪都不是它的对手，每次喂食，母亲都拿杆子打着大花猪，让别的猪吃完了再让它吃，但那天，大花猪却怎么喊也不过来吃。过了半小时，母亲再去看，大花猪还是一动不动趴在地上。

母亲说，去喊老党过来给猪看看。父亲说，这么晚了，还是等天亮再说吧。又过了半小时，母亲又去了猪圈，发现那头花猪越来越没精神，怕熬不到明天，便差父亲赶紧去喊老党。

父亲打着手电骑去了二十分钟后，老党的声音传来：“猪的眼睛红不红？脖子肿没？粪便怎样……”

母亲立马开门相迎，发现老党是父亲用小推车推来的。老党一瘸一拐走进猪圈，先给大花猪测体温，然后又挨个给别的猪也测了体温，发现别的猪没被传染，这才放心给大花猪打针、开药。忙完了，父亲要送老党回家时，老党说，他在猪圈观察观察再说。父亲请老党进屋里休息，说他和母亲在猪圈看着就行，可老党不同意，说他俩看不出门道，再说当年在生产队时他经常睡猪圈，习惯了。

早年，老党是队里的饲养员，队里的猪、马、牛，都归他管，只要有牲畜生病了，他就白天晚上守着，又喂水又喂药，那些年他饲养的牲畜没有一头病死的。队长见他上心，便派他出去学习兽医，学成回来，老党成了饲养组的组长。

老党医术很高，牲畜得病，他一般都能治好。可每当别人夸他时，他却说：“什么医术高超，都是碰，碰巧对了症，就医好了。很多病我也看不透，所以不见牲畜活蹦乱跳，我心里便没底儿。”

老党那天在我家猪圈守了一夜，第二天见大花猪起来吃食了，他才长舒一口气，让父亲推他回家。父亲每每提及此事都于心不忍，说那天老党去外村给猪看病，走得太急摔了跟头崴了脚，父亲去他家时，他还躺在床上下不了地，一听我家猪病了，他立马让父亲用小推车推着他往我家赶。老党忍着脚伤在我家猪圈坐了半宿，好人呐！

老党给家畜看病，只收本钱，这是他常年行医的规矩，乡亲们谁也不敢多给他钱，否则下次家畜生病了，就得另请高明。

老党其实不姓党，只因他是党员，又是热心肠，大家都喊他“老党员”，喊着喊着便省略成“老党”了。老党说，这个称呼他喜欢，可以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自己一辈子应该做的事。

